



陳伯達著

重要的問題在於學習

新華書店



店印行





2 040 6763 2

082
 7523
 00406
 年 月 日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陳伯達

——介紹列寧論學習經濟工作——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上所寫的一個題目。毛澤東同志在那裏所寫的是關於軍事問題。從人民解放軍勝利的實際看來，我們全黨響應了毛澤東同志的號召，已經大體上學會了戰爭，雖然在這方面我們還不能自己滿足，還需要繼續學習，要學習得更多，更好。除了在軍事這一方面應該繼續學習之外，顯然，今天我們特別要提出來學習關於經濟的工作與文化教育的工作。很久以來，毛澤東同志即號召我們學習這兩項工作，我們過去也學習過一些，做過一些工作，並且有過創造，以至是重要的創造，因此，在許多最艱苦的年月，我們黨在經濟的難關，提高了群眾政治的覺悟。這新成績，是不能歸廢滅的。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在這兩方面的工作，我們仍然是極端幼稚，有時簡直幼稚得可笑。



：第一，因為我們黨絕大多數的優秀幹部，二十幾年來一直為軍事與政治工作而奔忙，精力集中在那些方面，而不是在這些方面。當然，在經濟與文化的方面，我們也有優秀的幹部，但比起軍事與政治的方面來是太少了。第二，因為我們執政的地區，過去大都是較偏僻的農村環境，大工業很微末，商業鬥爭的問題是存在了的，但是，一般說來，經濟情況比起現在要簡單多了。同樣地，文化教育的情況也是比較簡單的。因此，過去的經驗是很不够用的。而且，經驗總是兩方面的，有正確的經驗，也有錯誤的經驗，我們許多同志沒有認真去學習這種種過去的經驗，也沒有認真去領會毛澤東同志關於這種種經驗的總結，因此，在新的環境下，一方面就可能不會利用過去的正確的經驗，另一方面又可能再犯過去的錯誤。

我們共產黨員，正如斯大林的名言：「是特種式樣的人。我們是由特別材料製成的」。對於我們共產黨員，是沒有什麼不能夠學會的。絕對不是不能夠學會，而是「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只要我們能夠遵守毛澤東同志的教訓而善於學習，那末，我們也就會像在軍事戰線上的百戰百勝一樣，我們在經濟戰線上與在文化教育戰線上仍將贏得百戰百勝。

沒有任何一人（連我們的敵人在內）能够懷疑我們在軍事上將在全國勝利。我們在軍事上將在全國勝利，澈底粉碎國民黨反動派，這是早經確定了的。但是，全國人民不只是需要我們在軍事上有本領，而且需要我們在經濟工作上，在文化教育工作上，有同樣的本領。特別關於經濟工作，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澤東同志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上面，就嚴重地警告過我們：「我們不但應該會辦政治，會辦軍事，會辦黨務，會辦文化，我們也應該會辦經濟。如果我們這樣能幹，惟獨對於經濟無能，那我們就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歡宴職工代表會上，毛澤東同志又說：「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麼有益的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毛澤東同志這些話已說了好多年，到了現在，人民是更迫切地需要我們在這些方面的本領了。過去因為所處的條件，我們這些方面的本領雖然差些，

也還沒有特別顯出迫切的危險性來，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已經有、並且將繼續擁有大城市與工業區，我們將擁有全國，特別是大部分解放區已消滅了封建，而帶有社會主義成份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即帶有社會主義成份的公營企業已有增加，並且將日益增進其在經濟上的領導作用（雖然它今天在經濟上的比重還是很弱小的），如果我們——人民首腦的共產黨員——還不去特別努力學習，真正學會經濟工作與文化教育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那末，即使我們軍事上在全國完全勝利了，我們也還可能在經濟上競爭不過別人，也還可能變成是「一些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

本年三月間，大公報刊載了一篇通訊。是一個從鞍山出來的工程師投稿，裏面很嚴厲的批評了我們，措辭很不禮貌，其中有幾句話，說是：「……對於農村，他們（指我們共產黨人）是駕輕就熟，很有辦法。對於都市，尤其一個工業城市，顯然生疏得很，他們還是非常的缺乏人材，但是鞍山的共黨當局却不知道收羅人材……」。大家知道：大公報是一個黨國民黨而經常敵視我們，反對我們的報紙，該稿作者也沒有摸清我們民族真正的出路，但是，我們暫且不管這些，上述的幾句話，却是值得我們注

意的。我們並不怕那反對我們的人發現了我們的弱點，也不管人家對我們的措辭譏諷不禮貌；我們所怕的，就是我們不敢正視我們自己的弱點，不肯用力去克服我們的弱點。事實上，在工業城市方面，我們固然「生疏得很」，就在農村方面，我們也不能驕傲自滿，我們也有生疏的東西，我們是有許多東西要繼續學習的，如果學習得還不夠，我們在農村中也還可能犯錯誤。如毛澤東同志「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就指責了我們曾經在農村工作中犯了一些過「左」的錯誤。

在新鮮事物面前，或在生疏的事物面前，誰要賣什麼「革命老資格」，自稱「英雄」，誰就要碰得皮破血流。這真是無情得很的。不管你過去的歷史多麼光榮，但在這裏不求長進，就成爲落伍者。

沒有什麼是可以「生而知之」與「不學而能」的，也沒有什麼是有學够的時候。向誰學習呢？我們的先生是到處可以找到的。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八年論學習的時候曾經告訴我們：「……我們的先生多得很——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大資本家、地主、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全世界，他們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同時又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當向他們或多或少的學到一點東西。」毛澤東同志這些話對於我們今天各部門的工

作仍然保存了全部的價值。就是說：我們要向各種群衆學習，向同盟者學習，以至向敵人學習。當然，毛澤東同志的意思不是要圍圍吞棗的學習，而是要批判的學習。

由於我們在經濟工作上還不善於學習，還沒有學會很多（當然是從一般來說），我們已嘗過了不少苦頭。特別是三四年來，我們革命的局面擴大了，經濟的事情更多更複雜，而我們的進步不夠，甚至有的就把舊的狹小的經驗亂套一頓，我們的苦頭也就嘗得更多，吃虧更大。不少多財善賈的商人，利用我們小生產經濟分散的弱點，還企圖耍弄機噐和操縱市場的習把戲，並且因為我們善良，因為我們對這類行業還不精明強幹，他們就欺侮了我們。當然，那些躲在我們領導的公營工業或公營商業的機構內的壞人也欺侮我們老實，覺得我們只會幹政治，不會幹經濟，就把我們的老實看成傻瓜，而甚至發現過這樣的事情，即可以一手把我們的公家貨物從後門運出，另一手就把這些貨物送進前門來賣給我們，同時繼續向我們領取他的薪水。因為我們的生疏，在工業中我們有些同志曾經做過很多荒謬絕倫的事情，不管我們領導的公營工廠有很多優越的條件，但是有些工廠却是在賠本的情況下過日子，競爭不過私人資本，以至於不但是工人，而且也使那些存心的確良善、願意幫助人民事業發展的工程師、技師或善於管理企業的職員也

要爲我們搖頭，覺得我們在這些方面還太過於幼稚。

從客觀上說來，我們犯過的許多錯誤，在一定時候是很難避免的，甚至於不可避免的，因爲我們過去沒有做過，開頭要做，也就可能錯誤百出。然而經常錯了不改，這就是我們所不可允許的了，我們必須努力改造我們自己。

爲了能夠充分說明毛澤東同志關於「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這一個重要的方針，

這裏要特別介紹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後，施行新經濟政策的一個時期，關於共產黨人要學習做經濟工作的許多極寶貴的語言。雖然現在我們和蘇聯是處在不同的革命性質和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但是，如上所說，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已有社會主義成份的國家企業和私人資本主義並存着，而隨着革命局面的擴大，官僚資本的企業越多落入我們之手，變成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企業，同時我們又還面對着極廣大的散漫小生產者的經濟，因此，我們正遇到有重大歷史關係的複雜的經濟問題，而列寧這些關於學習做經濟工作的語言，好像就是對我們而說的。列寧這一切語言不只是對我們學做生意有益，而且對我們學習做各項經濟工作同樣有益。

列寧說：「我懂得，共產黨員爲了學習經商，的確是需要時間的，凡願學習此舉的任何人，在起初幾年之間，都會犯嚴重的錯誤的，歷史是會寬恕他的，因爲這種事情對他是一件新的事情。」（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在五金工人聯合會全體代表大會共產黨黨團會議上的報告）

列寧說歷史是會寬恕我們一些不可避免的錯誤的，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但是，列寧告訴我們：不要在錯誤面前盲目起來。列寧說：

「……最主要的是，要冷靜地會看出這種錯誤究竟是在那裏發生的，再從頭重新做起。如果我們不只是兩次，而是很多次不得不從頭做起的話，那末，這正表示出我們沒有偏見，是以冷靜的觀點來檢討我們在世界上的最偉大的任務的。」（在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就是說：我們對人民負責，負有歷史上偉大的任務，要去掉偏見，要冷靜地找到錯誤的根源，敢於改正錯誤，從頭重新做起。列寧說：

「如果一個共產黨員，負責的工作人員，都能明白地意識到：我們不會做事，

我們必須從頭學起，那時，勝利就一定是我們的了——在我的意見看來，這就是個最根本的結論」。（同上）

善於學習，則我們一定勝利。這就是列寧的結論。

列寧曾經反覆地描寫了當時俄國解放之後的農民以至工人對於共產黨人的批評與期待：

「……在現時，農民正以信用貸予我們；……他們會說：「好吧，如果你們現在還不能這樣做的話，那末，我們就等一等吧，也許你們會學會的。」不過，這種信用不能是無窮無盡的。」

「這一點，我們是必須知道的，在獲得信用之後，要立刻着手作。應當知道：這個農民佔多数的國家不再給我們以信用的時機，它要求我們（要是用一個商業上的術語來說的話）的時期，日益迫近了。他們將說：「現在就是這樣吧，親愛的統治者們，你倘在延遲這麼多月和這麼多年之後，一定能獲得一種最正確最可靠的、幫助我們解脫貧困、窮苦、飢饉及破產的辦法吧。你們是能夠有所作為的，這一點，你們也曾經證明過了。」我們不可避免地將要碰到的試驗，就是這樣：儲積

到底，這個試驗將要決定新經濟政策的命運及俄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命運的。」（同上）

「資本家是會辦供給的。但是他們作得非常不高明，他們是強盜式地作的，他們侮辱了我們，他們掠奪了我們。那般不知共產主義是幻物的單純工人和農民，都是知道這個的。」

「但是資本家總是會辦供給的，你們會嗎？……你們都是一些傑出的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你們所担負的那事業，經濟事業，你們却是不會作的。」這就是農民——而且通過農民，還為很多工人——在去年（按：指一九二一年）對共產黨所作的最單純最致命的批評。……」

「需要來一個真正的檢查。資本家正在併肩地活動着。他們正在強盜般地活動着，他們惟利是圖，但是他們是作得很巧妙的。但是你們呢？——你們試用新的方法作一下吧：你們並不獲利；你們的共產主義原則，你們的理想是好極了，這些原則和理想寫得這樣美麗，老實說，你們是理應入天國為聖賢的——然而你們會做生意嗎？實在需要來一個檢查，一個真實的檢查，這並不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加以調查

和責罰的這種檢查，也不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加以懲罰的這種檢查。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這樣的檢查，而是站在國民經濟見地上的那種真正的檢查。」

「允許共產黨人延期兌現，已經有過好多次了，貸給他們的信用之多，也是任何其他政府所從未得過的。自然，共產黨人曾經幫助農民從資本家與大地主底壓迫下解放了出來，農民是極重視這一點的，因此，他們給了共產黨人以延期兌現的信用，但這種延期，總有一定限度的。……然後，就要來一個檢查的：你們能不能把事情經營的不比別人壞呢？舊的資本家是會做的，而你們却是不會的。」（同上）

二十五年前列寧所描寫的農民以至工人對於當時在經濟工作上還很生疏的蘇聯共產黨員所作的批評與期待，現在在我們這裏，也正是遇到了。我們正遇到着類似的批評與期待。很多人批評我們，覺得不但商業，而且工業，資本家要比我們會搞。我們這裏的農民也期待我們在幫助他們從封建半封建及官僚資本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之後，能夠更「獲得一種最正確最可靠的辦法」，繼續幫助他們「解脫貧困、窮苦、飢餓及破產」。我們這裏的農民也期待我們能多供給他們一些物品，期待我們善於把工業和農業聯繫起來，善於把農民在經濟上聯繫起來，並使他們避免投機商人買賤賣貴的壓迫；希望我

們要善於和破壞國民經濟的投機鬥爭。我們這裏的農民也相信我們是能夠這樣做的，因為在我們領導之下，他們已親身經驗根本的利益，並相信我們對人民事業的忠心，相信我們的能力。所有中國的人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人是翻天覆地的英雄幹了不起的中堅人物，都知道我們什麼都能學會，並會學得比別人高明，以至可能高出百倍，只要我們肯學的話。如果中國共產黨人是不肯學的話，中國也就沒有希望了。但是，在我們解放區，不論工人、農民，或其他人民，除了高興我們已經發現的東西之外，對於其他還沒有發現的東西，他是期待我們不要延遲時間太久，而是更快地發現。當然，我們一些根本的辦法是有的。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同樣地早已指出了我們在進行土地改革之後，繼續解脫農民貧困的道路，可是我們很多地方不會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方針去做，不會具體化，或者做得很粗惡，使得很不切實際，很不耐心，所以就延長了發現的時間。

毫無疑問，我們也正在碰到試驗，在整個經濟戰線上（包括工業、農業、商業、金融）的試驗，而這些試驗將要決定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命運以及將來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命運。

毫無疑問，蘇聯共產黨員在列寧與斯大林的指導之下，結果是學得那末出色，值得

那末驚天動地，那末，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也一定不會辜負我們中國人民的期待，凡是蘇聯共產黨員能夠做到的，我們便也可同樣做到，而根本的條件，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要能够像蘇聯共產黨人那樣善於學習。

列寧認為必須三番四覆地學習，學了不會又學，學了不會又學，一定要達到目的。

「我重複說一遍：由於我們有正確政策的結果，我們從人民大眾那裏獲得了信用和延期兌現，用新經濟政策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期票，但是在這種期票上沒有載着年月日，它們將何時要求兌現，你是不知道的。這就是危險之所在，這就是政治期票和普通的、商業上的期票不同的特點，必須把我們一切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一點上，而不要以為在一切國營托拉斯及合辦公司中有着負責的和優秀的共產黨員為滿足，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為這些共產黨員不善於作生意，他們遠不如在大工廠及大公司中受過訓練的那般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再用那同樣的偉大的俄羅斯語來說，共產黨人的自負心在這裏還依然存在。問題是在於負責的共產黨員——雖然是很好的，雖然是非常誠實，忠心耿耿的，雖然他曾經忍受過苦役而不畏死難，但他卻不會做買賣，因為他不是一個經營商業的人，他

沒有學習過怎樣做生意，也不願意學習，也不了解他必須從 A B C 學起。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幹過世界上最偉大革命的革命家，一個為衆目所注視（如果不是為四十個金字塔所注目，則無論如何是為歐洲四十個國家所注目）而抱着從資本主義下面解放出來的希望的人——他應當從一個普通的店員學習起，這個店員有十年的商店經驗，他懂得怎樣做生意；而負責的共產黨員與忠實的革命家，却不僅不知道經營商業，而且甚至他還沒有覺悟到他不知道經營商業這回事。」

「因此，同志們，如果我們能把這種初步的愚昧與無知糾正過來，那末這將是一件巨大的勝利。我們在離開這個大會時，應當確信我們還不懂得這一點，以後應從 A B C 學起。畢竟我們還是革命家（雖然有許多人說——這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們已經官僚化了），我們能够理解這種簡單的事情：即是在一件新的非常困難的工作上，應當善於好幾度從頭做起；如果在開始以後，你碰壁了，那末你再重新開始，那怕十次改作，直到你達到你的目的為止，不要因為你是一個共產黨員而裝腔作勢，而再自高自大，要知道一個非黨的店員，也許是一個白黨——我們就確定他是一個白黨吧——很善於從事在經濟上必不可缺的一些事情，而你却是不會

的。如果你是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有着成百的官職頭銜，又是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功臣」，如果你理解這一點，那你一定能達到你的目的，因為這種事情是可以學會的。」

「雖然在過去一年間（指一九二一年），我們有了小小的成績，但這些成績是微小不足道的。主要的事情，是一切共產黨人還沒有這種廣泛的認識和覺悟，就是在目前，我們——俄國負責的和最忠誠的共產黨員的這種本領，比任何一個老黨員都要差些。我再重複的說一遍：我們必須從頭學起。如果我們認識了這一點，那末，我們的考試是會合格的了，這一考試是很嚴重的，這一考試是由日益迫近的財政危機所造成的，是由我們所從屬的與之聯繫而不能分離的俄國的和國際的市場所造成的……這一考試，是極嚴重的，因為在這裏，人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能擊敗我們的。」（同上）

顯然，列寧告訴了我們：首先我們共產黨員要有「廣泛的認識和覺悟」（啊，是廣泛的認識呀，是廣泛的覺悟呀），知道了在這經濟工作方面我們比別人差，而後我們才會去認真地學習，而後我們的考試才會合格。

因爲社會主義與私人資本的「競爭是非常地激烈的」，當時列寧是這麼警告的：「這一考試是極嚴重的，因爲在這裏，人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能擊敗我們的。」列寧並指出這一考試將由十分痛苦的財政危機及內部的和外部的市場上的危機表現出來。

列寧指出了管理事業的技能與文化程度是相關聯的：

「這裏，須要明白地提出問題，我們的力量究竟在那裏？我們缺少些什麼東西？政治的權力是十分足夠的。這裏未必有人會說，共產黨人，共產黨，在某一個實際問題上，在某一個事務機關當中，是缺少權力的。基本的經濟力量是在我們的手中，一切帶有決定意義的大企業、鐵路等等，都在我們手裏。……缺乏什麼東西，這是一目了然的：現在感到缺乏的，是管理機關的那部分共產黨員的文化程度。如果以莫斯科爲例——它有負責的共產黨員四千七百人——如果我們拿這個權力的官僚機構爲例，那末我們就舉一個問：究竟誰在領導着誰呢？我非常懷疑是否能夠說：那些共產黨員在領導着這個巨大的機構。老實說一句，並不是他們在領導着人家，而是人家領導着他們。這裏發生的事情，正如同童年時代人家講給我們的歷史故事，人家教我們說，有一個時候，一個民族征服了另一個民族，戰勝的民族成了征

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則成了戰敗者。這是很簡單明瞭的。但是這些民族的文化如何呢？在這裏，事情就不大簡單了。如果戰勝的民族，其文化高於戰敗民族，則前者迫使後者接受其文化，在相反的場合，則戰敗的民族迫使戰勝的民族接受其文化。（按：在我們中國歷史上，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就是：戰敗的漢族結果迫使戰勝的契丹、女真、蒙古與滿洲諸族接受漢族的文化。）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是不是也發生了這同樣的事情呢？這四千七百個共產黨員（這已近於一師的人數，並且他們全體又是最優秀的），是不是也服從了他人的文化呢？是的，在這裏人們可能得到這樣的印象，以為在這種場合之下，戰敗者有着高度的文化。但實際的情形，決不是如此的。他們的文化是很可憐的渺小的。但是它比較我們的文化還是要高些，不論它如何的可憐與貧弱，然而它比我們負責的共產黨員的文化水準總要高些，因為這些共產黨員缺少管理事業的才能。共產黨員在領導某一機關時——有時，怠工者們故意巧妙地迎合他們，以便利利用他們作為掩護物——常常被人欺騙和愚弄。承認這個事實，自然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情；然而我認為這一點是必須加以承認的，因為在現時，這正是問題

的焦點所在。……」

「蘇聯與俄國共產黨的負責的共產黨員，他們是否會理解到他們是不會管理呢？他們是否覺察到，他們自以爲是領導人家，而事實上他們是在被人家領導呢？如果他們覺悟到這一點，那末他們自然就能學習。因爲這是能夠學習到的。爲了這，是應當學習的；但是我們的同志却並不學習。我們的同志到處發命令出佈告，然而結果却與他們所想像的相去甚遠。」（同上）

在革命勝利的初期，我們是沒有法子不承認我們的文化是比較別人要低些，在中國，這事實是同樣明顯的。雖然在我們這裏，地主階級也罷，資產階級也罷，它們的文化程度，是更加可憐，更加渺小，但是這是像列寧所說的一樣：「它比我們的文化還是要高些，不論它如何的可憐與貧弱，然而它比我們負責的共產黨工作人員的文化水準總要高些，因爲我們缺少管理事業的技能」。這樣，我們是不可能依靠發命令出佈告來解決問題的，我們必須而且也只能依靠學習來解決問題。在這裏，驕傲就會是愚蠢以至滅亡。

一九二一年四月間，列寧「論糧食稅」即已指出：

「不要害怕共產黨員去向資產階級專門家『學習』，其中也向商人，也向小的合作社資本家，也向資本家『學習』，向他們學習應按另一種形式，但實質上是與我們曾向軍事專家學習並學會了的一樣。『學習』的結果，只有靠實際經驗來檢查；要效倣比旁邊資產階級專門家所做的好一些，要能够用各種辦法振興農業、振興工業，使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發達起來。爲了『領教』要不惜破費，多花點錢去學習，決不可惜，只要能受到教益。」

寫這些話過了約近一年，列寧又說：

「如果共產黨人能够用他人的手來建設經濟，而自己則向這資產階級學習，並使資產階級走上利於我們所要走的道路時，那我們便能管理這種經濟了。但是，如果一個共產黨員自以爲我既是負責的共產黨員，我什麼都懂，我所戰勝的人要比店員高明得多，我們在前線撕殺過，並且還不是同這樣的人撕殺哩！——正是這類佔優勢的情緒在戕害我們。」（同上引在聯共十一大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因此，列寧指出了要善於與非黨人員合作：

「……必須辦到這一步，即：使那些與我們合作並在數量上遠超過我們好多

倍的大批分子，能够這樣來進行工作，以便我們能善於監督和管理他們的工作，我們能理解這種工作，應用他們的手作出對共產主義有益的事情來。目前形勢的中心關鍵就在這裏，因為雖然有個別的共產黨員已經理解和看到了這一點，但是，我黨的廣大群眾對吸引非黨人員參加工作一點之必要，還沒有認識。……」

完全可以明白：列寧當時的這些意見是適用於現在的我們的。

我們要善於學習，要學習使自己會建設經濟；要學習在公營企業中，在合作社企業中，一方面，善於與非黨的專門家合作，善於向他們學習技能，另一方面，則又須善於和暗害的特務分子、破壞分子及怠工者作鬥爭；要學習在建設整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的事業中，一方面，善於和那些擁護新民主主義政權、經營正常營業而能够並有能力組織生產的「文明的資本家」實行經濟的聯盟與經濟的共處，另一方面，則又須善於與那些經營投機事業而破壞國民經濟建設的「不文明的資本家」作鬥爭。而在這一學習過程中，我們是必須盡量發揮各地方各部門的創造積極性。正如列寧「論糧食稅」的結論上所說過的：「在振興農業與工業的周轉中，無論如何要在各方面極力發展地方的主動性，首創性和獨立精神。研究這方面的實際經驗。這種經驗儘可能要是各式各樣的。」

如果有人攔起官僚架勢，表現官僚習氣，既不善於學習這樣，也不善於學習那樣，而辦起事來一場糊塗，那就該怎樣辦呢？列寧主張把他交給法庭，加以審判，以便證實他是否一種犯罪之人。列寧指出：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員是好的，並不是犯罪之人，可是許多人並不善於處理實際工作，因循苟安，雜亂無章，胡衝亂撞。列寧說：

「在我們的鬥爭中，我們必須記牢：共產黨員是需要深思熟慮的。他們可以很漂亮地告訴你關於革命鬥爭，關於全世界鬥爭狀況的事情。但是，爲了打破絕望的貧困與窮乏，則須要成爲一個深思熟慮，有教養，有條有理的人；可是他們不會這些。如果我們對負責的共產黨員加以指責，說他們作事不誠實，那是不對的。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九，可說不僅是誠實之人，而且證明了他們在沙皇制度顛覆以前以及革命之後的最困難的條件下面，都是忠於革命的人，可以說他們都是供獻了他們生命的人。因此，要想在這方面找出事業的原委來，那在根本上是錯誤的。我們所需要的，乃是對於最單純的國家事務之文化的處置。我們必須理解，這種事務是國家的事務，是商業上的事務；如果有何種障礙的話，就應當善於克服這些障礙，將這些犯有官僚習氣的人交給法庭。我想無產階級的法庭是善於處辦

的，然而爲了懲辦起見，那就應當找到犯罪的人。我可以向你們担保，在這一天的事件（按：列寧指當時一個向外國購買食品的事件）當中，是不會找到犯罪的人的，請你們都仔細考察一下，就可知道犯罪的人是沒有的，而所有的，只是各式各種無謂紛擾、奔忙與無意識的事情而已。……沒有一個人是善於處理事情的；沒有一個人懂得對於國家的事務是應當這樣來處理；而不應當那樣來處理。一切白黨及怠工者，都恰恰利用了這一個弱點。」

列寧所責備的那種從事「各式各種無謂紛擾、奔忙與無意識的事情」的人，也就是我們這裏平常所指的爬行的經驗主義者與煩瑣的事務主義者。在我們解放區，同樣地起如列寧所指出的：「問題的要點不在於握有政治權力，而在於善於管理經營，善於適當地佈置人員，善於避免小的磨擦，以便國家經濟不要終斷。」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經驗主義者與事務主義者變成「一個深思熟慮、有教養、有條有理的人」呢？除了善於學習又學習，以便提高自己管理事業的技能，提高自己的文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使得我們善於處理事情，善於管理經營，善於適當地佈置人員，並使我們經營和管理的事業能夠迅速地趕過別人與競爭過別人呢？

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四月間對於蘇聯共產黨工作所作的結論，現在同樣地變成我們今天在中國解放區從事建設工作的結論。列寧說：「現在，全部關鍵在於，先鋒隊不要害怕教育自己、改造自己，公開承認自己沒有充分準備和沒有充分本領等等。全部關鍵就在於現在要協同更無限廣泛和無限強大的群眾前進，務必協同農民一起前進，用事實、實踐和經驗證明給農民看，我們是在學習，並要學習來幫助他們，領導他們前進。在俄國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在俄國目前的生產力狀況下，只有極緩慢地，極小心地，腳踏實地，千百次實際檢查自己的每一步驟，才能解決這個任務。」（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開幕時的演說）

這結論也就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陝甘寧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大會上所作的演說的最後兩句話：

「中國靠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

（原文載「石家莊日報活頁文選」）